

西汉长安的丞相府

宋 杰

内容提要：西汉长安丞相府的位置在未央宫东阙之外，府中设有百官朝会殿，供朝廷举办各种形式的“集议”以及上计、举谣言和习肄礼仪等大型活动，是周代外朝的遗存。相府采用“四出门”，与皇家宫室宗庙陵园的布局形制相类；其内外以府门、中门、閤及所属垣墙分为三个区域，府门有阙、署，无塾、阊，不设钟铃、建鼓，东西门各有长史驻守。中门内为相舍，设有正堂、庭、后园与诸曹吏舍，黄閤之内为丞相燕居听事之地。

关键词：丞相 相府 相舍 百官朝会殿 四出门 閤（阁） 黄閤（阁）

西汉丞相是百官之长，其职位和影响相当重要，因此长期以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涉及这一官职的名称、渊源、职权、僚属、发展过程与变化原因、三公之间的关系等许多方面，^①但是对丞相起居治事的相府却少有探讨。20 世纪前期，古建筑学家刘敦桢曾在《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中略述西汉相府的概况，^②后来则未见有相关的专门论著。笔者拟就这一机构在长安城中的方位、建筑形制与布局及源流演变等问题进行寻究，希望能够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 相府在长安城中的方位

西汉时期，“长安有九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府，鸿胪府，少府，司隶府，中尉府，京兆府，左冯翊府，右扶风府”^③。在上述京师官署当中，关于相府的位置没有明

① 对于西汉丞相制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安作璋、熊铁基：《秦汉的丞相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5 期；《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1984 年。祝总斌：《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年。李俊：《中国宰相制度》第一篇《秦汉》，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 年。

②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1932 年 9 月。

③ [元] 骆天驥：《类编长安志》卷八引《图经》，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255 页。

确的文献记载。由于当代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对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获得了重要成就,能够基本勾画出这所城市的建筑布局,它的城墙周长约 25700 米,城内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建筑群较多,现已发现的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以及武库等旧址占据了大部分面积。^①由于皇帝居住的未央宫是“正宫”,它的位置对城市规划建设即其他宫室与官署、第宅、市场闾里的选址会起到具有支配作用的影响,所以笔者准备以它为坐标,来确定丞相府在长安城中的大致方位。

根据汉长安城遗址发掘的平面简图来看^②,未央宫偏居在城内西南一隅,天子和百官吏民出入宫殿主要是通过东、北两面的门阙,其宫城西、南两面的城墙紧靠长安城的西、南城墙,间隔只有十几米到五十米;^③如此狭窄的空间之内不可能安置丞相府那样的大型建筑,因此它的选址只能从未央宫的北、东两边来考虑。考古发掘表明,未央宫北阙之外,在桂宫和北宫旧址之间未发现宫殿群的建筑遗存,根据文献记载,这一地段应是皇帝赐给功臣贵族的第宅区域,例如汉高祖、哀帝的宠臣夏侯婴、董贤的宅第就在那里。^④北阙以外又有西域、匈奴等藩国使臣、侍子居住在藁街的“蛮夷邸”,附近可能还有众多“郡邸”和诸侯“国邸”,以及掌管有关事务的大鸿胪之“鸿胪府(寺)”^⑤;但是未见有其他公卿官署设置在该地的记载。

未央宫之东,在武库和长乐宫旧址之南,也分布着未发现宫殿或其他皇室建筑群遗存的广袤区域。据史籍记载,那里修建过权臣霍光的宅第(位于尚冠里),以及属于九卿的官署“中尉府”,它后来被改做京兆尹的“京兆府”。^⑥如前所述,未央宫经常通行使用的是东、北两门,过去按照颜师古的解释,北门是皇宫的正门。“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⑦近年来学术界基本否定了上述观点,

① 参考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考古》1987年第10期。

②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图一《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考古》1996年第10期。

③ 参见刘庆柱《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未央)宫城南墙和西墙分别与长安城南墙和西墙相邻,其间相距一般约为50米。宫城北墙西端,与长安城西墙东折之城墙南北间距仅13米。”《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④ 参见《汉书》卷四一《夏侯婴传》及注,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2079页。《汉书》卷八六《王嘉传》,第3496页。

⑤ 参考刘庆柱《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西汉中期开始,官邸统由大鸿胪所辖,为了便于管理,属于官邸的‘国邸’和‘蛮夷邸’相距不会太远。考虑到这些官邸主人的政治地位,其邸第当近皇宫。‘蛮夷邸’在藁街,藁街在未央宫北,大概即横门大街,故‘国邸’亦应在藁街附近的未央宫东北一带。”《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71页。另参见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⑥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三辅黄图》云:“京兆在尚冠前街东入,故中尉府。”第737页。参见王社教《汉长安城八街九陌》,《文博》1999年第1期。

⑦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七年二月条注,第64页。

认为东门才是未央宫的正门。如杨宽先生举《汉书·五行志上》语：“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罍思灾。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罍思在其外，诸侯之象也。”据此认为：“其实东门比北门更重要，东门是接受诸侯朝见的正门。”^①他又引证张衡《西京赋》“朝堂承东，温调延北”之句，指出未央宫朝堂是用以接待东来朝见的诸侯，温调殿则用以接待北来谒见的臣民，后者即“上书奏事谒见之徒”。刘庆柱先生也反对颜氏的看法，论证道：“未央宫作为使用的正门应为东宫门，皇帝出入于此门，东宫门外有专供天子使用的驰道。诸侯王朝见天子也要进东宫门，因而东宫门之外设置了象征诸侯王朝见天子的‘罍思’。”他还指出：“未央宫以东宫门作为正门使用，可能受到了‘秦制’影响。在秦的王室、皇室重要建筑中，多以东门为正门，如凤翔秦公诸陵陵园、秦东陵陵园和秦始皇陵园，其正门均为东门。”^②黄展岳先生亦认为：“长乐、未央二宫东西并列，地位相当……未央宫之东宫门和长乐宫之西宫门，分列轴线两侧，为二宫之正门。”^③以上诸说受到普遍赞同。日本学者五井直弘曾据此推测西汉“中央的各官署在东阙附近”^④，但是并未进行具体论证，而有些史料则反映出当时丞相府设置在这一地带的种种迹象。

按照西汉朝廷的有关制度，皇帝在丞相患病时前往探视，车驾须从相府西门进入。如《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载其担任丞相期间受到皇帝谴责而自杀，“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颜师古注曰：“《汉旧仪》云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从西门入。”因为天子通常出入未央宫东门，由此看来，丞相府的位置有可能是在未央宫之东，与其东阙相对，这样皇帝出宫沿驰道而行，正好进入相府的西门。上述《汉旧仪》等记载并非孤证，还有其他史料可以为其提供支持。首先，是东汉前期司徒府设置地点的情况。司徒府的前身即丞相府，它的许多制度保留了西京旧典，例如其方位的选择。司徒府的正门是西门，面对当时皇帝居住的南宫东门之苍龙阙。见《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注引蔡质《汉仪》：“司徒府与苍龙阙对，厌于尊者，不敢号府。”^⑤孙星衍等辑《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亦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为大司徒，主司徒众，驯五品。府与苍龙阙对，厌于尊者，不敢称府也。”^⑥

阙是标识宫门的建筑，依照方位而涂画有不同的动物。《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阙”条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苍龙

①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② 刘庆柱：《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考古》1995年第12期。

③ 黄展岳：《读〈汉长安城未央宫〉》，《考古》1997年第8期。

④ (日)五井直弘著，姜镇庆、李德龙译：《中国古代史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⑤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3560页。

⑥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201页。

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①《三辅黄图》亦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②西汉未央宫东门之阙即名为苍龙阙，因为苍龙是东方七宿的总称。^③东汉洛阳的南宫亦然，《续汉书·百官志二》载卫尉属下有“苍龙司马，主东门”，刘昭注曰：“案《雒阳宫门名》为苍龙阙门。《汉官》曰：员吏六人，卫士四十人。”^④另可参照《元河南志》的《后汉京城图》。^⑤上述史料反映出西汉丞相府应与东汉司徒府的建筑方位相同，都是处于皇帝正宫的东面，其西门与宫城的东阙，即苍龙阙相对。宋儒陈绛即强调了两汉公府设置的这一沿革，“西汉去治世未远，开丞相府四出门，无阑，不设铃，不惊鼓，深大宏远，无有限节。郡国守长吏得以岁上计事，国有大议，车驾亦亲幸而临听焉，然其议不过军功武爵期会督责之故。至于东汉，仍建公府苍龙阙东偏，其制度虽存，而称号不复于当时”^⑥。杨宽先生亦赞同《汉仪》的记载，即东汉三公的官府“靠近南宫的东门。司徒府和南宫的东阙相对”^⑦。

另外，应劭《汉官仪》曰：“明帝以为司马（笔者注：应为“司徒”）、司空府已荣，欲更治太尉府。时公赵熹也。西曹掾安众郑均，素好名节，以为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官寺，旱魃为虐，民不堪命，曾无殷汤六事周宣云汉之辞。今府本馆陶公主第舍，员职既少，自足相受。熹表陈之，即见听许。其冬，帝临辟雍，历二府，光观壮丽，而太尉府独卑陋云。显宗东顾叹息曰：‘惟牛纵酒，勿令乞儿为宰。’”^⑧按照文献记载，汉明帝驾临辟雍共有两次，分别在永平二年（59）和永平八年（65）。前引《汉官仪》提到“朝廷新造北宫”，其事应在永平八年。^⑨这段记载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东汉洛阳三公的官署相邻，为南北依次排列。因此明帝南赴辟雍时接连看到了路旁诸公府的改建情况。又《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注引应劭曰：“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明帝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为东西门耳。”（第3560页）是说东汉司徒府南北两侧受相邻的太尉、司空府挤迫，无法

① [晋]崔豹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0页。

②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三《未央宫》，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0页。

③ 《艺文类聚》卷六二《居处部二·阙》引《三辅旧事》曰：“未央宫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16页。《水经注》卷一九《渭水》：“（未央宫）北有玄武阙，即北阙也。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阊阖、止车诸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8页。

④ 《后汉书》，第3580页。

⑤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附《〈永乐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图2《后汉京城图》，《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第44页。

⑥ [宋]陈绛：《新修东府记》，《宋文鉴》卷八一，[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13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42页。

⑦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38页。

⑧ 《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刘昭注，《后汉书》，第3558页。

⑨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八年，“冬十月，北宫成。丙子，临辟雍”。第111页。

像西汉丞相府那样四面开门，只得设置了东西两座大门。以往《元河南志》的《后汉京城图》与王仲殊所绘的《东汉雒阳城平面示意图》^①均认为三公官署是东西并列，张鸣华先生在《东汉的南宫》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纠正。^②

其二，东汉司徒府在不同时期的地址有所改变。张鸣华先生根据前引《汉官仪》的叙述，认为东汉明帝时司徒府位于洛阳南宫的正南方向，“三公府应该是在南宫门到平城门大道的东侧，所以显宗东顾叹息”^③。这一观点是合理有据的。但是他进而批评《元河南志》的《后汉京城图》和蔡质《汉仪》关于“司徒府对苍龙阙”的记载并不准确，则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上述史料有可能讲的是司徒府在东汉不同时期的设置地点，所以未必与应劭所言对立。如前引《汉官仪》中郑均语：“今府本馆陶公主第舍，员职既少，自足相受。”光武帝第三女名为刘红夫，“（建武）十五年封馆陶公主，适驸马都尉韩光”^④。至明帝时，由于韩光参与淮阳王延谋反案被杀，公主失势。^⑤可见东汉建国之初皇宫以南地段原为贵族第宅区域，三公的官署尚未设置在那里。据史籍所言，光武帝中兴后废除新莽弊政，努力恢复汉朝典章，所谓“奄有天下，不失旧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⑥此时的洛阳北宫破败荒废，皇帝居于南宫；故笔者判断，司徒府应是仿照西汉制度，设于皇宫东门之外，如蔡质《汉仪》等所载，面对南宫的苍龙阙。而明帝继位之后大兴土木，“起北宫及诸官府”^⑦，即《汉官仪》中郑均所言“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官寺，旱魃为虐，民不堪命”。其总体工程自永平三年延续到永平八年才结束^⑧，三公诸府很有可能是在此期间迁徙到皇宫南面的。公府由东向南转移的原因也可以理解，那就是三公作为国家秩位最高的臣僚，其官署应该设在皇宫的正门之外；而两汉京师的宫城布局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汉未央、长乐二宫是东西相峙，故未央以东门为正门；而东汉明帝修建北宫投入使用之后，洛阳两宫成为南北排列，皇帝居住的皇宫之正门即变为南门——朱雀门。这样一来，三公官府面对南宫东门的传统格局就与现行宫室制度发生冲突，故被朝廷下令向南搬迁，以靠近皇宫的正门。由此看来，东汉初年国家草创，司徒府的选址虽仿效西京旧制，但未能考虑京城规划建设的远景。全国政局稳定后，朝廷重新安排洛阳

①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页。

② 参见张鸣华《东汉的南宫》，《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张鸣华：《东汉的南宫》。

④ 《后汉书》卷一〇下《皇后纪》，第458页。

⑤ 参见《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第1444页。

⑥ [晋]袁宏：《后汉纪》卷七《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4页。

⑦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07页。

⑧ 参见《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07、111页。

的城市建筑布局,又根据形势变化对其位置进行了调整。^①

再者,汉代帝陵的陪葬制度也可以作为相府位于未央宫东边的旁证。皇室权贵的墓葬往往是他们生前住所的缩影,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②。西汉皇帝陵园的形制建筑也因此而呈现出某些规律,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在《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中论述甚为详细,总的来说是帝陵园模仿未央宫城所筑,亦以东门为正门,陵墓封土似皇帝的正殿,其四周的墙垣犹如皇宫的宫墙,帝陵与皇后陵东西对置,象征着未央宫和长乐宫。西汉诸陵多有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陪葬,这些陪葬墓一般分布在陵区东部和北部,此类现象亦为社会现实情景的写照。“至于分布在陵北的陪葬墓或陵邑,这还因汉代视未央宫北阙附近为‘甲第’,不少权贵,如霍光、夏侯婴、董贤等均被赐宅地于此……死后在陵北或陵东安葬,这是他们京城生活的反映。”^③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陵园的陪葬墓群中,在汉初担任过丞相职务的萧何、曹参之坟墓均被安置在长陵东门之外。如汉和帝祠高帝陵庙诏书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后容城侯无嗣。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垅,循其远节,每有感焉!”李贤注引《东观汉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又引《庙记》云:“曹参冢在长陵旁道北,近萧何冢。”^④萧、曹二墓相邻,都被安排在长陵之东,这也应该是西汉丞相府曾经设置于未央宫东的一种变相反映,能够从侧面给本文的观点提供某些证据。

二 “百官朝会殿”的功用及渊源

(一) 相府有“殿”

秦汉宫室中的高大堂屋往往称“殿”,通常为帝王所专用,但是西汉长安的丞相府内亦设有殿。如宣帝时黄霸拜相,曾在接受上计时对郡国官吏宣布:“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⑤颜师古对此“殿”解释道:“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据文献记载,汉初的萧何、曹参、韩信府内亦设

① 汉明帝后来可能又将三公府向东迁移,《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注引《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外。”《后汉书》,第3558页。其位置参见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图一八《东汉雒阳城平面示意图》。

②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9页。

③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④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72页。

⑤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黄霸》,第3632页。

有“殿”。如《汉宫阁名》曰：“萧何、曹参、韩信并有殿。”^①《初学记》卷二四亦言西汉长安有“萧何、曹参、韩信诸殿”^②。按汉初萧何任丞相，汉王二年（前205）八月，又“以（韩）信为左丞相，击魏”^③。而韩信在破魏灭赵之后拜为相国，随同他作战的副将曹参则升任右丞相。^④是时汉有韩、萧、曹三人并为相国、丞相，看来他们在长安的府内均设有殿；斯人虽没，殿名犹存。清儒沈自南认为古时之“殿”原指较大的“堂”，后来才为皇帝所专用。“《苍颉篇》：殿，大堂也。虞挚云其制有经，左城右平。平，以文砖相亚次；城者为阶级。是殿与堂同，但有大小耳，即今所谓三墀者是也……汉黄霸令计吏条对，有举孝子先上殿。宫殿又通上下言之，秦以后始为至尊之称。”^⑤西汉权贵第宅中高堂亦有称“殿”者，如霍光死后，“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鹄数鸣殿前树上”^⑥。司隶校尉解光劾奏王根奢华逾制，“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两市，殿上赤墀，户青琐”^⑦。哀帝宠幸董贤，“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绋锦”^⑧。颜师古注：“重殿谓有前后殿，洞门谓门相当也。皆僭天子之制度。”但是东汉以后除了帝王之宫有殿，官宦豪贵府中不再使用此种名称。

前述西汉权贵第中之殿或属于逾制而建，而相府之殿却与此不同，它具有某些特殊的政治功用，这可以从其专门的名称反映出来。据干宝注《周礼》所言，东汉司徒府内有“百官朝会殿”^⑨，是继承西汉旧制而来。郑玄注《周礼·槁人》时亦曰：“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之殿”^⑩，他在注《周礼·朝士》又说“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⑪，则是此殿的别称。

（二）百官朝会殿的功用

西汉相府与东汉司徒府中的百官朝会殿，在当时的国家政治领域发挥着何种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大致有以下几项。

1. 朝议。这是它的主要功用。汉代国家如果遇到重要事务或疑难问题，需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往往通过召开朝会即所谓“朝议”、“廷议”来进行讨论，为皇帝

① 《艺文类聚》卷六二《居处部二·殿》，第1121页。

②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四《殿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1页。

③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2613页。

④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曹）参以右丞相属韩信。”第2027页。

⑤ [清]沈自南：《艺林汇考·栋宇篇》卷一《宫殿类》，[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859册，第11页。

⑥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56页。

⑦ 《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28页。

⑧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董贤》，第3733—3734页。

⑨ 《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刘昭注，《后汉书》，第3560页。

⑩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750页。

⑪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877页。

的决策提供建议和参考方案。这种会议通常在宫内进行^①，但有时也在丞相府或司徒府的殿中举办，如王应麟所言：“时有大政，政有大疑，必集群臣议之，咨一相决之。乃于司徒府建朝会之殿，以绎师言，审国是，焕乎一代闳规也。”^②根据讨论的各种事项，参会的官员和机构亦有不同，可分为下述几类：

(1) 公卿百官议。这是大规模的朝会，皇帝或亲临相府，在此殿上与公卿讨论议决。如前引郑玄注《周礼·蒿人》曰：“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之殿，云天子与丞相旧决大事焉。”（第750页）应劭《汉官仪》亦云：“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国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③刘敦桢先生评论相府百官朝会殿曰：“应劭谓为外朝之存者，其说甚当。盖西汉初营长安，萧何袭秦制，仅置前殿，供元会大朝昏丧之用，而庶政委诸丞相，国有大政，天子就府决之，观殿西有王侯以下更衣所，足为会朝议政之证。”^④

有时皇帝也会下诏让丞相领衔召开此种会议，将讨论意见上报天子裁决。如武帝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肄丞相诸侯侯。’”^⑤这里所说的“有司”是指负责司法审判事务的廷尉，他向朝廷请求逮捕相关人犯，武帝则让他和诸侯王列侯与丞相会同商议。《史记集解》引徐广注此句曰：“诣都座就丞相共议也。”即命令廷尉和在京王侯到丞相所在的“都座”去举行会议。“都座（坐）”是东汉后期至南北朝尚书台八座长官（令、仆射、诸曹）集议政务之处^⑥，西汉尚未见其名称。^⑦当时丞相总揽政务，如刘颂所言：“秦汉已来，九列执事，

①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第2950页。《汉书》卷七九《马奉世传》：“永光二年秋，陇西羌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右将军奉世入议。”第3296页。《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每公卿会议，常引秉上殿，访以边事，多简帝心。”第716页。

② [宋]王应麟：《汉百官朝会殿记》，《玉海》卷二〇四《辞学指南》，[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948册，第366页。

③ 《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后汉书》，第3560页。

④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刘敦桢文集（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

⑤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93—3094页。

⑥ 参见[宋]任广《书叙指南》卷一七《撰策谋度》：“都堂聚议曰都坐议政。”[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920册，第569页。《资治通鉴》卷一二八《宋纪十》孝武帝大明二年：“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胡三省注：“魏有都坐大官。魏之都坐，犹唐之朝堂也。或曰都坐尚书。都坐即唐之政事堂。”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4035页。

⑦ 尚书台“都座（坐）”之名，初见於东汉后期的文献记载，如应劭《汉官仪》卷上：“汉制：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座交礼，迁又解交。”[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143页。《蔡中郎集》卷二《答诏问灾异八事》载其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诣都座。[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1063册，第161页。

丞相都总。”^①而尚书官职卑小，并无议政之权。孙逢吉说秦朝“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置尚书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汉初因之，武宣之后，稍以委任”。尚书台权力的膨胀是从东汉开始，“及光武亲掇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尚书令为端揆之官”^②。至西晋时，尚书台长官基本上相当于汉代三公，即国家宰相，其官署亦正式成为公卿集议的场所。而在西汉时期，起着“都座”作用的地点则是相府的百官朝会殿。如祝总斌先生所言：“随着尚书台发展成宰相机构，百官商议也从旧百官朝会殿（汉代原在司徒府）移至尚书都坐或朝堂进行，因地在尚书省，估计习惯仍由尚书令或仆射居首座主持。”^③所以在审判淮南王安谋反一案时，武帝让在京诸侯王与列侯、廷尉都到丞相府去讨论，即徐广所言“就丞相共议也”。经过商讨，“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刘端还建议处罚淮南国秩二百石以上的官员及相关的宗室近幸臣。最后则是以丞相为首、廷尉为副汇总讨论意见上奏，由皇帝斟酌决定。“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④

又如元狩六年（前117）大司马霍去病请求汉武帝决定诸皇子的王位，武帝让丞相庄青翟、御史大夫张汤等组织百官会议研究。见《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但武帝对讨论结果不满意，“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随后丞相等人揣摩上意，又“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再次奏报武帝，才获得批准。

前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会肄丞相诸侯议”，《史记索隐》注曰：“肄，习也，音异。”是说“肄”有演习的含义。汉代国家对各种朝议有规定的典制仪式。“肄丞相诸侯议”是按照既定的丞相诸侯朝议制度演习执行的意思。王应麟曾举《续汉书·律历志中》记载为例，考证公卿百官在相府殿上举行朝会的仪式。熹平四年（175）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奏言当时的历法不准确，灵帝下诏，“与儒林明道者详议，务得道真。以群臣会司徒府议”（第3037页）。刘昭注引《蔡邕集》记载了这次朝会的座次和议程：“三月九日，百官会府公殿下，东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将、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议郎、博士西面。户曹令史当坐中而读诏书，公议。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与（冯）光、（陈）晃相难问是非焉。”^⑤王氏据此判断两汉实行过在丞相（司徒）府百官朝会殿议政的制度，“国有大

①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303页。

②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八《尚书令》，[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923册，第197页。

③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216页。

④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94页。

⑤ 《续汉书·律历志中》注引《蔡邕集》，《后汉书》，第3037页。

议，车驾亲幸其殿，则应劭之书可证。百官会府公殿下，则蔡邕之言可稽”^①。

(2) 丞相府议或“两府”议。皇帝将有关议题交给丞相，让他和府中掾吏集议，再上报意见。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咸阳宫酒会时，博士淳于越建议朝廷应仿效周代制度分封宗室子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斥责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第254—255页），并奏请执行焚书令，得到皇帝的批准。如果只看这段记载，可能会认为李斯的这番言语是在那次酒会上当场提出的，但是他的发言事关政治文化领域的国家大计，又包含着对“藏书”、“偶语诗书”等各种犯罪行为分别处罚的具体方案，其内容庞杂繁复，很难相信是李斯临场发挥的即席演说，应该是经过仔细推敲和充分准备之后才上奏的。另外，皇帝也不大可能因为淳于越的临时提议而立即停止宴饮，将正在进行的酒会活动更改为争辩讨论。结合其他史料来看，《史记》所说的“始皇下其议”其实是下诏命令丞相府在宴会以后集议，再由李斯汇报讨论意见，供皇帝裁决。见《论衡》卷二八《正说》：

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谏。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诗家之书也。^②

由主管部门长官与僚属共同商讨来决定对重要问题的处理意见，西汉称为“有司议”。而相府总揽全国政务，属吏人数繁多，其中长史、诸曹掾等秩位较高，须经考选才能充任，^③故皆学识出众。如薛宣谓朱云：“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④丞相与相府诸吏之间既是上下级，又是主人、宗师和宾客、门生的关系。“掾史见礼如师弟子，白录不拜朝，示不臣也。”^⑤说明其地位很受尊重。他们往往精通公务，熟悉典章律令，能够在商议时为丞相出谋划策，以求获得允当的处理方案。

西汉由相府官员集议的例证，还可参见《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载窦太后使景帝封王信为侯一事。“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

① [宋]王应麟：《汉百官朝会殿记》，[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948册，第367页。

② [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6页。

③ 参见《汉旧仪》卷上：“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副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9页。

④ 《汉书》卷六七《朱云传》，第2916页。

⑤ 《汉旧仪》卷上，[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7页。

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这里所说“与丞相议之”的“与”，应是“给予”、“交付”的意思，并非是皇帝和丞相一起商议；因为下文明显说的是丞相在组织议论之后，才向景帝进行汇报的。又如《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曰：“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汉书》卷九〇《酷吏传》载田延年贪污骹车之费，“凡六千万，盗取其半。焦、贾两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议奏延年‘主守盗三千万，不道’”。都是在说同样的情况。相府集议的人数多少尚无明确记载，但从廷尉府内集议有廷尉、正、监、廷尉史等三十人参加的情况来看^①，相府奉诏集议的规模显然会更大一些，其地点亦应在专用于群臣议政的百官朝会殿。刘敦桢先生指出，西汉相府“升殿脱履，与宫殿同制”^②。其典出自《汉旧仪》卷上：“掾有事当见者，主簿至曹请，不传召，掾见脱履，公立席后答拜。”^③即掾吏上殿谒见丞相之礼。

此外，更为重要的问题则由三公之间商议。如《汉书》卷二三《刑法志》载：“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但是这几位大臣协商后均不愿改变旧法，便回绝了文帝的建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在回复时坚持自己的主张，才迫使他们同意废除收孥相坐法。但西汉太尉不常设，较多的是由“两府”^④即丞相府与御史大夫府的官员们举行集议。如宣帝时西羌叛乱，京兆尹张敞上书言：“愿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赎罪。”此项条奏遭到左冯翊萧望之与少府李强的反对，“于是天子复下其议两府，丞相、御史以难问张敞”^⑤。又成帝时梁王刘立荒淫无道，“鸿嘉中，太傅辅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亲近，不可谏止。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尽出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事下丞相、御史，请许。奏可”^⑥。亦是此类例证。丞相贵为百官之长，由他领衔议事，恐怕不会屈尊低就、亲率僚属到御史府去，朝议地点也应是在相府的百官朝会殿。

① 参见高恒《秦汉简牍中法律文书辑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96—400页。

②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刘敦桢文集（一）》，第136页。

③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7页。

④ 《汉书》卷八三《薛宣传》：“宣考绩功课，简在两府……”颜师古注：“两府，丞相、御史府也。”第3391—3392页。

⑤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77页。

⑥ 《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15页。

为了防止朝议进行时背离仪典程序,以及出现违法或不当的言行,朝廷通常要指派专人监督。或是由皇帝特派的使者充任,如宣帝甘露元年(前53)召五经名儒与太子太傅等人大议殿中。“《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①颜师古注曰:“使者,谓当时诏遣监议者也。”或是派遣宦官,如灵帝熹平元年为决定窦太后葬仪,“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②。西汉丞相由于经常主持集议,故府中设有议曹,选任干吏充任,专门负责有关事务。^③相府高级掾吏亦有监督朝会之职责,如果朝议过程中发生问题而未能当场纠正,则要其追究责任。如黄霸“守丞相长史,坐公卿大议廷中,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黄)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④。

相府或“两府”集议的具体经过,史书缺乏记载。因为这种议政形式普遍存在于汉代中央和地方郡国的官署之内,故可以参考张家山汉简《奏谏书》案例二一《廷尉署集议事例》的有关情况。在讨论当中,下级并不惟长官之命是从,也可以据理反驳力争,促使其改变最初的意见。^⑤如班固所言:“若夫丞相、御史两府之士,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选也!’”^⑥

(3) 丞相与有司议。汉代文献中所见的“有司议”,是由中央各主管机构举办的讨论各自专管事务的会议。^⑦如兴修水利的会议在司空府进行,或由府中掾吏主持;^⑧有关刑狱问题则归廷尉府负责集议。而丞相总揽政务,统领诸卿,因此有时也参加较为重要的“有司议”。如汉景帝元年(前156)秋七月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⑨再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3)下诏:“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⑩这是命令主管部门“太常议”,但是丞相公孙弘也参加了大会,事后他向朝廷汇报,“谨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

①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8页。

② 《后汉书》卷五六《陈球传》,第1832页。

③ 《汉旧仪》载丞相四科选士,“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9页。

④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黄霸》,第3629页。

⑤ 参见高恒《秦汉简牍中法律文书辑考》,第396—400页。

⑥ 《汉书》卷六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第2904页。

⑦ 参见荣远大《汉晋集议制度初探》,《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⑧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载王莽时议治黄河,“沛郡桓谭为司空掾,典其议”。第1697页。

⑨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0页。

⑩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1—172页。

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①。并“请为博士置弟子员”^②，获得武帝批准。九卿秩位明显低于三公，丞相亦不应到其府内参议，当如讨论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件那样，“有司”长官掾属等“就丞相议”。

2. 上计、举谣言。即王应麟《汉百官朝会殿记》所言：“受计则计吏数百人拜于庭中，举谣言则掾属令史会于殿上，崇辅弼以尊国体，意深远哉！”^③汉代郡国每年岁末进行统计，随后派遣官吏进京，把包括户口、公私垦田、钱谷收支、社会治安状况等数据的计簿上报呈献给朝廷，称做“上计”。皇帝受计于宫中或陵庙，及临幸所在之行宫。^④按照秦朝及西汉制度，各地上缴的有关文书最终汇集到丞相府。刘邦入咸阳后，“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⑤。陈埴对此评论道：“沛公之入关也，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库。萧何独先入收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世常以刀笔吏少何，此特书生之论耳。”^⑥上计的事务亦由相府总管，如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⑦。又匡衡封邑在临淮郡，“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⑧。《汉仪注》则曰：“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⑨是说郡国每岁所上图籍有正副两本，分别上缴史官和丞相府那里保存。各地上计官吏亦到相府觐见，并汇报有关情况，有时朝廷还让诸卿与博士参加，其地点也在百官朝会殿。可参见《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京兆尹张）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鸛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第3632页）

接受计簿的仪式结束后，由丞相出面代表皇帝向殿下的郡国计吏宣告诏敕。见《汉官旧仪》卷上：“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计室掾吏一人大音者读敕毕，遣敕曰：‘诏书数下，禁吏无苛暴，丞长史归告二千石，凡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明诏忧百姓困于’

①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9页。

②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2页。

③ [宋]王应麟：《汉百官朝会殿记》，[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948册，第367页。

④ 参见韩连琪《汉代的户籍与上计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3期。高敏《秦汉上计制度述略》，《秦汉史探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4—195页。

⑤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第23页。

⑥ [宋]陈埴：《木钟集》卷一一《萧何》，[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703册，第750页。

⑦ 《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第2676页。

⑧ 《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3346页。

⑨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注引如淳曰，第2709页。

衣食，二千石帅劝农桑，思称厚恩，有以赈赡之，无烦扰夺民时。公卿以下，务饬俭恪。今俗奢多过制度，日以益甚，二千石务以身帅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谨以法，养视疾病，致医药务活之。诏书无饰厨传增养食，至今未变，或更尤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且案不改者，长吏以闻。守寺乡亭漏败，垣墙阤坏所治，无办护者，不称任，先自劾不应法。归告二千石勿听。’”^①此段文字，《续古文苑》卷五题为《元寿二年丞相遣郡国计吏敕》。西汉末年至东汉，丞相虽改称司徒，但是接受郡国上计的制度却延续下来。例如，“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②。

在百官朝会殿上进行的另一项活动是“举谣言”。两汉考课郡国长吏约有三种途径，皆与丞相或司徒有关。一是通过岁末的上计，由三公进行赏罚。二是各州刺史监察检举，再由三公派遣僚属复核后处理：“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③。三是朝廷派出使者访察各地风俗，收集民间舆论上奏，或称“举谣言”，以此作为考察吏治的依据。^④此项措施沿袭了古代施政者采摭诗歌谣谚以匡正过失的制度。西周时，“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⑤。颜师古注“采诗，采取怨刺之诗也。”班固又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⑥据应劭追述，西汉时访举风谣的工作结束后在相府百官朝会殿上汇报。“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国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每岁州郡听采长吏臧否，民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⑦并说这种制度保留到东汉，仍在司徒府的百官朝会殿上举行，先宣布对各地长吏政绩的调查，再由座上的府中掾吏集体评议。不过此项举措已经流于形式，提到褒美之言则众人随声附和，遇有贬词非议却多钳口无语。“顷者举谣言者，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各尔衔枚。”^⑧观风使者往往汇报一些无关痛痒的信息，或凭个人感情而有所扬抑，故被应劭批评为：“大较皆取无名势，其中或有爱憎微裁黜陟之暗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践周、召之列，当轴处中，忘謇谔之节，悼首尾之讥，县囊捉撮，无能清澄，其

①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38—39页。

② 《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传·赵壹》，第2632页。

③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43页。

④ 参见全晰纲《汉代的乡里风谣与举谣言》，《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马新《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胡守为《举谣言与东汉吏治》，《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吕宗力《略论民间歌谣在汉代的政治作用及相关迷思》，《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⑤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23页。

⑥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08页。

⑦ 《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刘昭注引《汉官仪》，《后汉书》，第3560页。

⑧ 《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刘昭注引《汉官仪》，《后汉书》，第3560页。

与申屠须责邓通，王嘉封还诏书，邈矣乎！”^①

3. 肄习礼仪。《周礼·小宗伯》曰：“凡王之会同军旅甸役之禘祠，肄仪为位。国有祸灾，则亦如之。”郑玄注：“肄，习也。故书肄为肆，仪为义。杜子春读肆为肄，义为仪。若今时肄司徒府也。”贾公彦疏云：“言王有会同军旅甸役之事，皆有禘祠之法。云肄仪为位者数者禘祠皆须豫习威仪乃为之，故云肄仪也。”^②汉代宫廷举行各种典礼仪式必须事先演练，以达到熟习之目的。如《汉书》卷六六《杨敞附子惲传》曰：“（戴）长乐者，宣帝在民间时与相知，及即位，拔擢亲近。长乐尝使行事肄宗庙，还，谓掾史曰：‘我亲面见受诏，副帝肄，秬侯御。’”（第2891页）服虔注：“兼行天子事，先肄习威仪也。”这种活动又称为“习肄礼仪”^③，而宫廷典礼场面宏伟，人数众多，排练时需要较大的场地。如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集鲁地儒生三十人，“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④。文中的“绵蕞”，即演习礼仪所用的竹竿、绳索等站位标志。见应劭注：“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仪其中也。”如淳注：“谓以茅翦树地，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传》曰‘置茅蕞’。”（第2127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典礼在刘邦即皇帝位之后不久，长安的许多宫室（如未央宫）和官署建筑尚未竣工，看来叔孙通当时在城内还找不到合适的场所，才被迫带领学者和弟子们到野外去演习。据前引郑玄所言，东汉朝廷的“肄仪”活动被安排在司徒府，这也可能是沿袭西汉的旧制。由于皇家大型仪典的排练不便在宫禁之内举行，丞相府的百官朝会殿和殿前庭院就规模、形制而言与朝廷近似，应该说是理想的演礼场地。

（三）百官朝会殿的由来与相府方位之再证

综上所述，百官朝会殿的主要功用是举办各种朝议。由于皇帝不常至，该殿主要是作为公卿大臣（包括掾属）进行议政的场所，故又称为“天子以下大会殿”，兼有上计、举谣言和肄习礼仪等国家级的大型活动。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西汉丞相在府内设殿、主持百官朝议的现象是前所罕见的；而东汉以降宰相制度又发生变化，由独相制改为群相制，大臣议政的场所移至宫中尚书台的“都坐”，所以百官朝会殿的设置属于秦汉社会特有的现象。作为历时数百年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有哪些历史渊源？为什么会得到实行？这些问题值得史家关注。前述郑玄、干宝等人对百官朝会殿的记述，都提到它是周代外朝的遗存。“朝”（chao）有两义，一为

① 《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刘昭注引《汉官仪》，《后汉书》，第3560页。

②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768页。

③ [唐]杜佑：《通典》卷五三《礼十三》注引晋虞挚《决疑》云：“汉初置博士而无弟子。后置弟子五十人，与博士俱共习肄礼仪。又增满五百人，汉末至数千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2页。

④ 《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第2127页。

动词，即朝会、朝见，通常是指臣民在宫内进见国君，汇报、建议或商讨国事。二为名词，专指狭义的“朝廷”，即帝王宫中或贵族官僚府宅之内的庭院及殿堂。周代国君、卿大夫皆有内外朝，如公父文伯之母所称：“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①而杜佑说周代天子诸侯与臣下议事有四朝，各在其宫室的不同位置，由内及外分别为燕朝、治朝、外朝、询朝。因为询朝是在“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特殊场合才设^②，所以典籍多未列入。“但言三朝者，以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③杨伯峻先生曾对此作一概述，甚为精当，现征引如下：

（周代）天子诸侯皆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燕朝。诸侯之宫门有三重，曰库门，即外门；曰雉门，即中门；曰路门，即寝门。外朝在库门之内，断狱决讼及询非常之处，君不常视；治朝在雉门之内，或谓之正朝，君臣日见之朝。古者视朝之仪，臣先君入，君出路门立于宁，遍揖群臣，则朝礼毕，于是退释路寝听政，诸臣至官府治事处治文书。王朝有九室，诸侯之朝左右亦当有室。燕朝一曰内朝，如议论政事，君有命，臣有进言皆于内朝。^④

那么，周代外朝有哪些活动与百官朝会殿的功能有渊源关系呢？首先，西周春秋时期天子诸侯的重要、疑难事务往往需要“谋及卿士”，即与首席执政官及从政诸卿（高级军政大臣们）共同商议来决定，时间为每日早朝或临时召集的特别朝会上，均在宫内举行。^⑤西周金文中屡见之“卿事（士）寮”，学术界通常认为是王室执政大臣即诸卿的联席会议，这一机构集议事、决策、布令、施政诸权于一体。^⑥日常政务可以由首席执政大臣或诸卿集体处理，重大事务则由周王亲自决断。诸卿议事施政的场所有两说，或曰在“治朝”，如郑玄注《周礼·天官大宰》曰“治朝”是“群臣治事之朝”^⑦。又《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郑玄注：“外，路门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诸曹治事处。”^⑧杨伯峻先生则认为“治朝”是周代天子诸侯各部门处理日常公务的地方，而“外朝”

① 《国语》卷五《鲁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4页。

② 参见《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73页。

③ [唐]杜佑：《通典》卷七五《礼三十五·天子朝位》注，第407页。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闵公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3页。

⑤ 参见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⑥ 参见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杨宽《西周中央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李西兴《卿事（士）考——兼论西周政体的演变》，《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李学勤《论卿事寮、太史寮》，《松辽学刊》1989年第3期；郝铁川《西周春秋的内朝与外朝》，《史林》1991年第2期。

⑦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650页。

⑧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928页。

是诸卿即执政大臣们早朝之后商讨国事、颁布政令的场所。《左传》闵公二年载鲁公子成季“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杨氏注曰：

雉门之外右有周社，左有亳社。间于两社，外朝正当其地，其实亦总治朝内朝言之。治朝不但有君臣日见之朝，诸臣治官书亦在焉。《说苑·至公篇》云：季孙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夹）于两社之间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则间于两社者，不仅朝廷之所在，亦执政大臣治事之所在也。间于两社谓为鲁之大臣。^①

需要强调的是，周代内外朝又有广义、狭义的不同概念。如徐鸿修先生据郑玄对《周礼》“阍人”、“朝士”、“司士”、“大仆”等注指出，“‘治朝’对库门外的外朝而言为‘内朝’，对燕朝而言，又可称为外朝”^②。因此，在暂时难以确认上述两说孰是孰非的情况下，笼统地讲周代诸卿议事施政的场所是在广义的“外朝”，即包括“治朝”和雉门之外狭义的“外朝”，应该是没有疑议的。

其次，外朝还是负责刑罚的“司寇”或“士”断狱之地，可参见《周礼·秋官司寇》中“乡士”、“遂士”、“县士”、“方士”诸条。如果有重案、疑案，国君还要会同公卿亲临外朝会审。杜佑亦云周代“外朝之法，朝有疑狱，王集而听之，故《礼》云王会三公会其朝者，诸侯未去，亦于此也”^③。而每年政府关于户口、刑狱等文书亦由司寇属官负责统计，岁终时上缴朝廷，周王与公卿大臣们都要参加这一仪式^④，由此可见它是秦汉政府“上计”活动的渊源。

周秦之际的宫中“外朝”建置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君主取消了“日朝”的制度，不再每天清晨接见臣下。如范雎为秦相，欲推荐蔡泽为官，必须等到秦王上朝之日。^⑤汉武帝即位后喜好游猎，甚至一去数天。“时夜出夕还，后赍五日粮，会朝长信宫。”^⑥自宣帝时才规定有固定的上朝时间，称为“朝日”，五日一朝，^⑦但后来又往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闵公二年，第263—264页。

② 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第87页。

③ [唐]杜佑：《通典》卷七五《礼三十五·天子朝位》，第407页。

④ 参见《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孟冬祀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又，“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73—874、878页。

⑤ 《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后数日，入朝，言于秦昭王”云云。第2424页。

⑥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7—2848页。

⑦ 《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上于是数以朝日引见丞相、御史，入受诏，条责以职事”，颜师古注：“五日一听朝，故云朝日也。”第3043—3044页。《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历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第3624页。

往得不到遵循。^①其次是执政公卿会议的权力日益衰弱，而首席政务官“相”、“相国”、“丞相”却逐渐总揽政务，如楚之春申君，秦之魏冉、范雎、吕不韦等等。像秦始皇那样勤于政务且独断专行，“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②，“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则是因为他“贪于权势”^③，属于此阶段之特例。对于战国以来丞相职权加强的演变趋势，汉晋以来多有论述者。^④这一趋势的显著表现，就是西汉前期丞相之权力甚重，能够直接任用、撤消乃至处死朝廷官员，封驳诏书等等，对此前人多有论证。^⑤春秋后期至汉初政治领域的上述变化可以概括为：君主渐不亲政，外朝的权力和影响日益增强。这一变化表现在地域方面，则是部分施政机构和议政场地由宫内外移。例如某些权臣为了自己方便，不再每日到宫中上朝，而在自己的宅内设置朝廷，让卿大夫每日来家中朝会议政并处理公务，即变家朝为公朝。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之庆封为相，“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嫫氏，易内而饮酒。数日，国迁朝焉”。杨伯峻注：“（庆）舍，庆封子，庆封当国，不自为政，以付舍。”“杜注：内实，宝物妻妾也，移而居嫫家。”^⑥是说庆封当国后因喜好田猎而把执政之事交给其子庆舍，自己则带领财宝妻妾移到其属大夫卢蒲嫫家居住，而齐国群臣原来每日到庆封家朝会，现在则随之转移到卢蒲嫫家。“庆封虽以政付子舍，但己仍任当国之名，诸大夫仍往就卢蒲嫫之家而朝。”^⑦齐国朝会大臣的工作餐因此也在卢蒲嫫家供应，并受到侍者的盘剥。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子雅、子尾怒，庆封告卢蒲嫫。”杨伯峻注：“公膳为一词，即在公朝办事用餐，由朝廷供给伙食。六朝谓之客食，唐朝谓之堂餐。每日双鸡，盖大夫之膳食。”^⑧郑国执政大臣伯有亦在家内设朝，会见国中群臣。见《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

①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第2165页。《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书五人。自是陵迟，朝礼遂阙。可复五日视朝之仪，使公卿、尚书各以事进。”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415页。

②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096页。

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④ 《汉书》卷八三《朱博传》载何武言：“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废而不治也。”第3404页。《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故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第1565页。《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第1303页。[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三师三公尚书都省》：“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页。

⑤ 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29—34页。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第114—138页。

⑥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八年，第1145页。

⑦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八年，第1145页。

⑧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八年，第1146页。

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既而朝，则又将使子皙如楚，归而饮酒。”杨伯峻注：“群卿大夫先朝伯有，犹齐之大夫朝庆封。朝者已至，伯有饮尚未止。”^①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百官朝会殿出现的萌芽和前奏。从秦朝及汉初的官职设置情况来看，宫内留下的少府、太仆、卫尉、郎中令等，多是和皇帝私人生活联系密切的机构。九卿的许多部门则被移至宫外，如宗正、太常、典客、廷尉、中尉、大司农、将作等。另外，原来设在外朝的朝会议政及典礼活动也有一部分转移到宫外举办；如前所述，秦及西汉由丞相主持的各种朝议还有“上计”等活动往往是在相府施行，天子甚至有时会屈尊俯就。政治领域中“朝会”制度的变化也表现在秦及汉初的宫室建筑布局上，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周代宫室的建筑平面多为纵长的长方形，采取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多进式院落的基本格局，^②以外朝、中朝、内朝三个区域彼此衔接。而两汉长乐宫、未央宫及东汉洛阳的南宫与北宫，各自的平面皆为正方形或近似方形，明显地压缩了外朝的面积，摆脱了周代宫室的传统影响。如刘敦桢先生所言，秦及西汉的宫室建筑形制与周代不同：

汉诸宫皆有前殿，一如《史记》载秦阿房前殿之例，独无《礼记》外朝、治朝、燕朝之法，其事尤为怪异。愚尝考未央前殿仅供元会大朝及婚、丧、即位诸大典之用，其庶政委诸丞相，故以丞相府为外朝，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更为内朝，亦曰中朝。盖文帝时未央仅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数者。而曲台者后苍说礼之处，渐台在苍池中，王莽死于是。宣室、温室属内庭，独承明为便殿，即上官太后废昌邑王处，在金马门内，然非属未央前殿之后，如古制三朝之衔接相承也。^③

此说至为精辟，而相府设置百官朝会殿可以看作是这种演变趋势的反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官朝会殿是原来周代宫内“外朝”的分离和向外延伸，因此该殿所在的丞相府设置于皇宫的正门（未央宫东门）之外、面对苍龙阙也就顺理成章了。关于这个问题，几位古代先贤已有认识和论述，例如宋儒程大昌对百官朝会殿评论道：“且其得名为殿者，以尝受朝备临幸，则他公府不皆有，而朝会临幸亦止在司徒府耶？按《汉宫典仪》：司徒府与苍龙阙对。则亦不在禁中，诸家谓古外朝在路门之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三十年，第1175页。

② 刘庆柱：“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平面的宫城，商代曾有发现，东周时期已较多出现，汉代以后流行，并成为宫城平面的主要形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这时期的宫城一般为坐北朝南的南北方向；其二，宫城除主体宫殿外，作为宫城轴线上的主要宫殿建筑群中宫殿建筑数量增加，使宫城轴线南北方向延长，从而将宫城平面南北加长。”“进入周代，由两座宫殿遗址组成的‘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之宫殿布局形制已相当普遍。如陕西长安的西周镐京遗址中的四、五号建筑，周原凤雏甲组宫殿遗址，凤翔马家庄三号宫殿遗址，河北赵邯郸王城宫殿遗址等，它们均由前后排列的朝堂与寝室两部分组成。”《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41、51页。

③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汉长安城及未央宫》，《刘敦桢文集（一）》第146—147页。

外，其地亦与古应也。”^①清儒惠士奇亦强调西汉相府的设置方位有《周礼》“外朝”制度的渊源，“橐人职内外朝。康成谓外朝，断狱弊讼之朝。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之殿，云天子与丞相旧决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欤……然则东汉三公府皆对苍龙阙也。周之外朝左右皆棘而中槐，则槐当在阙下。左九卿之庐，右诸侯之舍，中三公之朝，面三槐，对两观，与汉丞相殿对苍龙阙者正同，则外朝在雉门外矣。旧说在库门外，非也”^②。百官朝会殿是从周代的“外朝”设施发展与转移而来，这一情况可以说说明西汉丞相府设置于皇宫东门即正门之外的历史渊源。

三 “四出门”的建筑布局

应劭《汉官仪》曰：“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明帝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为东西门耳。”^③是说西汉长安的相府采取了“四出门”的形制，到东汉被取消。何为“四出门”？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它是汉代宫室宗庙和陵寝建设的流行格局。如两汉帝陵陵园的建筑形制大致相同，其垣墙的平面结构基本为方形，每面的中间开门，四条门道汇集到陵内的中心建筑。《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杂物，扞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④《古今注》记述了东汉历代帝陵的情况，光武原陵为“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虞皆在周垣内”^⑤。杨宽先生解释为：“陵园四周设有方形的‘周垣’，每边正中设门。”^⑥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质帝静陵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这是撤除了陵园周围的外墙，用“行马（木制的警戒阻拦设施）”来代替。冲帝怀陵则更为简化，仅“为寝殿行马，四出门”^⑦，并没有设置“司马门”。何谓“司马门”？根据史籍所载，它在汉代通常指天子和诸侯王的宫门，^⑧包括两重含义：其一是有兵卒守卫，将官为司马；其二是指宫城的外门，即表示里边还有一重围墙和宫门。如《史记集解》曰：“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⑨又《三辅黄图》卷二《汉宫》“司马门”条与之略同。也就是说，帝

①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五《殿》，[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852册，第197—198页。

② [清]惠士奇：《礼说》卷五《地官三》，[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101册，第495页。

③ 《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注，《后汉书》，第3560页。

④ 《续汉书·礼仪志下》注，《后汉书》，第3144页。

⑤ 《续汉书·礼仪志下》注，《后汉书》，第3149页。

⑥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⑦ 《续汉书·礼仪志下》注，《后汉书》，第3149页。

⑧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一《等齐篇》：“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

⑨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集解，第309页。

陵有无司马门表示陵园是否具备两重围墙（或以“行马”代替外墙）。

西汉的帝陵建筑形制亦然。如高帝“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宫寺，皆在中”^①。后来的帝陵沿袭其制，据刘庆柱先生总结：“自阳陵开始，帝陵陵园周长1600米左右，后陵陵园周长1100—1400米左右（孝昭上官皇后陵例外）。筑以夯墙，每面垣墙中间各辟一门，宽15米左右，一般东、北门略宽于西、南门。门立双阙，阙基一般长35米，宽10米左右，陵墓置于陵园中央。这种制度，终西汉一代。”^②汉代帝陵的这种格局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代，如《骊山记》曰：“始皇陵内城周五里，旧有门四。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邱并峙，人曰此南门也。”^③考古发掘表明，秦始皇陵园有内外套合的三城，“陵园三城，计有10门。重城的四面各自有门，其中东、西、南三面的六门是内外相对而直指陵冢”^④。考古学界认为西汉帝陵陵园实际上是模仿未央宫城所筑，“所不同的是规模上‘园陵小于朝廷’”^⑤。刘庆柱、李毓芳指出，“帝陵陵墓封土，似皇帝的‘正殿’，即所谓‘象生制度为殿屋’。帝陵玄宫‘设四通羡门’，我们对汉太上皇陵和汉宣帝杜陵的钻探中，发现了其陵墓各有四条墓道，每条墓道正居每面中央。帝陵陵墓四条墓道，犹如帝王为‘开四聪，延直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谏之旗’而开辟的‘四门’”。“帝陵封土四周的墙垣，犹如皇宫‘宫墙’。陵园墙垣四周中央各辟一门，此犹皇宫四门。”^⑥明堂、社稷、宗庙等各种礼制建筑也是如此。例如长安城南郊的西汉官社、官稷遗址，“其形制为两重垣，四出门的‘回’字形。外墙每面长600米，内墙每面长273米，各墙中央均辟一门……官社、官稷采用的是西汉礼制建筑的统一形制”^⑦。另外，“位于汉长安城南郊的明堂与宗庙遗址，各自周围筑墙，其平面均呈方形，边长分别为235米与260—280米，四面正中各辟一门，中心建筑居遗址中央。东汉雒阳的明堂、辟雍和灵台建筑遗址，其形制也是周围筑墙，平面呈方形，每面一门，中心建筑居中，不过其规模大小不同而已……”^⑧

从上述文献及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四出门”布局的基本特点：（1）多数整体建筑的平面呈方形，这是汉代皇宫、帝陵及宗庙等礼制建筑的共同特征，而秦始皇陵园平面则为长方形；都是每面各开一座大门，宫室或有掖门。四座大门的门道向内延伸，在封土、庙堂等中心建筑相交。（2）中心建筑物之外大多采用双重垣墙，呈

①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六《陵墓》，第362页。

② 刘庆柱：《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223页。

③ [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八《古迹》引《骊山记》，[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588册，第603页。

④ 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⑤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

⑥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

⑦ 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428页。

⑧ 刘庆柱：《汉宣帝杜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237页。

“回”字形；秦始皇陵园则有三重套合的垣墙。由此看来，应劭《汉官仪》所说西汉丞相“府有四出门”，是具备了很高的级别与规格，和当时的宫室、陵寝、宗庙、社稷等皇家建筑的形制相仿，且与通常外墙只是开前后二门的普通官廷府寺不同。刘敦桢先生曾指出，“汉制以丞相佐理万机，无所不统，天子不亲政，则专决政务，故其位最尊，体制最隆……其府辟四门，颇类宫阙，非官寺常制也”^①。并强调汉代皇室各种大型建筑和相府均实行“四出门”的形制，是非常特殊的历史现象。“岂两汉宫阙寝庙下逮丞相府咸四向辟门，明中亦有四门之设，殊为莫解。”^②

下面探讨西汉相府建筑布局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它有几重墙垣？前述的汉代帝陵陵园与各种礼制建筑大多是采用了双重围墙，即“四出司马门”的形制；少数则没有外围垣墙，秦始皇陵园则为内外三重墙垣套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帝陵陵园布局是对皇帝宫室的模仿，但并非完全照搬，只是一种简化的仿效。因为秦汉的皇宫警备森严，设有多道门禁，不止两重或三重垣墙。如薛宣所言：“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惟万变之备，于是制宫室出入之仪，正轻重之冠。故司马殿省门阙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③而据文献记载，西汉相府的墙垣应为内外三重。《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载袁帝让宠臣董贤去拜访丞相孔光，“光雅恭谨，知上欲尊宠贤，及闻贤当来也，光警戒衣冠出门待，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均敌之礼”。文中所说的相府院落明显是三进式的，孔光“警戒衣冠出门待”，这是在大门之外守候，看到董贤的车队则退入到“中门”，即在二门等待；车队到“中门”时，孔光又退入“阁”内，待客人入中门下车后再出阁相迎。按照史籍所载，两汉郡县官署中有围墙将其分为两部分，墙上开门，称为“阁”，或“闺阁”、“閤”。“阁内为单独的院落，即长吏与妻子仆人起居之舍。”^④如刘敦桢先生云：“县寺之听事则曰廷……见宾客及掾吏治理事之所也。听事之后有垣，其门曰阁。阁内为舍，若第宅之后堂，凡京兆府、郡府、县寺、传舍，皆如是。故太守县令有过，每闭阁自省，亦有藉此激发下僚者。”^⑤西汉相府之“阁（阁）”见《汉旧仪》卷上：“（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无钟铃。”^⑥《宋书·百官志上》亦言西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⑦。阁内是丞相平时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据战国后期至汉初成书的《墨子》中《备城门》以下诸篇，为了防御作战的需要，当时的兵家曾经提倡设置三道墙垣的官府建筑形制。如《墨子·号令篇》曰：

①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刘敦桢文集（一）》，第135—136页。

②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西汉陵寝》，《刘敦桢文集（一）》，第160页。

③ 《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兵部八十五·钩钺》引《汉名臣奏》，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629页。

④ 参见邹水杰《汉代县衙署建筑格局初探》，《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

⑤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刘敦桢文集（一）》，第138页。

⑥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7页。

⑦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220页。

“葆宫之墙必三重，墙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墙上。门有吏，主者门里，笱闭，必须太守之节。”^①此类设施和太守居住的官署“守宫”相同，“守宫三难，外环隅为之楼，内环为楼，楼入葆宫丈五尺为复道”。孙诒让注：“‘难’，当为‘雜’。《杂守篇》云‘堑再雜’，此三雜，犹言三币也。上亦云‘葆宫之墙必三重’。杂，训币，详《经上》篇。”^②岑仲勉注：“守宫，太守之居。三杂，三匝也，与59之‘三重’同解。”^③不过《墨子》所言可能只是某种设想或为战时的特殊情况，从文献与考古资料看，汉代郡县的官署多为有两道垣墙的二进式院落，前堂后寝，成“日”字形，如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宁城图”上所绘护乌桓校尉幕府的建筑形制^④，和当时普通贵族豪富的宅院相似，而与相府采用三道围墙的格局有明显差别。限于史料匮乏，西汉相府建筑布局详情已经很难了解，秦始皇陵园三重垣墙套合形制可以略备参考。

其次是相府的平面形状。如前所述，西汉各种“四出门”式建筑形制的平面多为较规整的方形（如皇宫、陵园、宗庙社稷等），刘庆柱先生认为这是由于模仿皇帝君主的正宫即未央宫的缘故^⑤；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平面则为长方形。西汉相府属于哪一种？在缺乏直接记载证明的情况下，笔者推测如下：西汉相府的建筑格局与其他官署有区别，如“开四门”；但亦有某些共同之处，例如都是在前堂后寝的官舍后面设有“后园”，供府内官员休憩游赏，可参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此种建筑设置也和高官贵戚私宅的布局相似。从汉代官僚贵族府寺第宅后园的有关记载来看，园中或有树林、池塘、土山、楼阁和供下人居住的房屋^⑥，故其面积有相当规模，后园和相舍的庭堂寝室前后配置，因此其建筑平面为长方形的可能性或许会更大。

①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0页。

②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第563页。

③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9页。

④ “正对着宁城南门的幕府大门‘幕府南门’，是一座三间单檐的大门，门的正中一间看去是洞开着的，门东直书‘幕府南门’四字……进了幕府南门，由东、北、西三面房屋围成一个庭院，东北角有一门（笔者注：即‘阁’）。按照汉代官署制度，门内有庭，过庭才是主要的建筑‘堂’或称‘听事’（亦称厅事），为其治事之所。”罗哲文：《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文物》1974年第1期。

⑤ “未央宫平面呈方形，这是作为皇宫不同于汉长安城其他诸宫的特点之一……未央宫的方形平面形制，对西汉时代都城长安附近的皇室园陵、宗庙和明堂辟雍等都有着直接影响，其主体建筑和整体建筑平面（指其城垣或围墙平面）均为方形。”刘庆柱：《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79页。

⑥ 参见谢承《后汉书》卷六《尹昆传》：“汝南尹昆为汝阴功曹。令新到官，问曰：‘园中有桑，以饭蚕何如？’昆曰：‘非初政所务。’令嘉其言。”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3页。《汉书》卷九八《元后传》：“（成帝）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于是上怒，以让车骑将军音。”第4025页。《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广陵王胥》：“胥宫园中枣树生十余茎，茎正赤，叶白如素。池水变赤，鱼死。”第2762页。《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第2793页。《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刘）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第914页。

一些。东汉至南北朝,三公公府俱开黄阁(阁)。梁朝王莹“既为公,须开黄阁。宅前促,欲买南邻朱侃半宅。侃惧见侵,货得钱百万,莹乃回阁向东。时人为之语曰:‘欲向南,钱可贪;遂向东,为黄铜。’”^①可见南朝官员升任宰相后其公府的建筑面积需要向前延长,说明它的平面形状应是长方形,这一制度是否有可能由汉代相府、司徒府的建筑形制沿袭而来呢?

四 相府内外建筑与相关制度

如前所述,相府之门前后有三重,即前引《汉书·佞幸传》所言孔光出候之府门、中门与阁(阁),可以根据这些门户与所属各道垣墙将相府的平面结构分为内外三个区域,再对其中建筑物和相关的起居、管理制度进行考释。

(一) 府门近旁设施与吏卒

相府门前有阙。前文已述,“阙”是宫室门外的两座建筑,又称作“观”。《古今注》曰:“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为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多少,故谓之阙。”^②《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注引《汉仪》曰:“府开阙,王莽初起大司马,后篡盗神器,故遂贬去其阙。”^③刘敦桢先生云:“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武帝时改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故知丞相府亦有阙也。”^④又《汉旧仪》卷上言相府“门署用梗板,方圆三尺,不堊色,不郭邑,署曰丞相府”^⑤。“署”即表明官衙名称的木牌,是官员秩位的标志。“署,位之表也。”^⑥相府大门之“署”与两汉官寺门上的“扁题”(牌匾)有别,它近似方形,“方圆三尺”,不涂颜色,不镶外郭,仅题“丞相府”三字。同属三公的御史大夫府门之“署”也是如此,“御史大夫寺在司马门内,门无扁题。署用梓板,不起郭邑,题曰‘御史大夫寺’”^⑦。

《汉旧仪》卷上曰:“丞相门无塾。”“塾”是汉代府寺门内两旁的门房。罗哲文考证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宁城图》护乌桓校尉幕府时说:“门东直书‘幕府南门’四字,门两旁有室,也称作庑,可以作为留居一般宾客的地方。”^⑧相府之门另一特点是不设门阑和钟铃、建鼓。见荀绰《晋百官表注》:“汉丞相府门无阑[阑],不设铃,

① 《南史》卷二三《王诞附莹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622页。

② [晋]崔豹等:《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卷上《都邑第二》,第9页。

③ 《续汉书·百官志一》,《后汉书》,第3558页。

④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刘敦桢文集(一)》,第136页注文。

⑤ [清]孙诒让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7页。

⑥ 《国语》卷四《鲁语上》,第171页。

⑦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一二《职官部下·御史大夫第六》引《汉旧仪》,第289页。

⑧ 罗哲文:《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

不警鼓。”^①“兰”即“阑”，为栅栏、栏杆^②；宫室、官署门前往往往设有此物，用以阻隔行人。见《说文解字·门部》：“阑，门遮也。”故又称“门阑”。如张仪谓楚王曰：“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③擅自出入宫室、关塞的罪名因而被称作“阑出”、“阑入”。前引荀绰书说相府不设门阑的原因是“言其深大阔远，无节限制也”。由于西汉相府有向朝廷举荐天下贤才的职责，去掉门阑以表示不阻碍士人之晋升，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汉朝宫室与官署通常设有钟铃和鼓，按时击奏以提醒官员吏卒起居休息，开闭大门。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曰：“凡中宫漏夜尽，鼓鸣则起，钟鸣则息。”^④府寺门前之鼓又称“建鼓”。如王林卿“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刀剥其建鼓”^⑤。颜师古注：“诸官曹之所通呼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谓植木而旁悬鼓焉。县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遇到紧急或重要情况亦击鼓报讯。《汉书》卷九〇《酷吏传》载“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注引晋灼曰：“使者至司农，司农发诏书，故鸣鼓也。”又桓帝延熹八年，“是时连月火灾，诸宫寺或一日再三发。又夜有讹言，击鼓相惊”^⑥。相府外门不设钟铃、警鼓，有专人待漏报时。见《汉旧仪》卷上：“丞相府官奴婢传漏以起居，不击鼓。”^⑦出土西汉相府漏壶铭文为“二十一斤十二两，六年三月己亥，年〔卒〕史神工谭正丞相府”^⑧。西汉宫内某些官署也不设鼓，如“御史、卫尉寺在宫中，亦不鼓”^⑨。

汉代官署皆有守门士卒，按照官秩高下规定人数。^⑩因为立于阑旁，故称作“门阑卒”、“门阑走卒”。参见汉明帝永平五年十月诏：“其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⑪“刘平为全椒（令）〔长〕，掾吏五日一朝，罢门阑卒署，各遣就农。”^⑫西汉相府门无阑，守卒称“门卒”。如《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

① 《续汉书·百官志一》“司徒”条刘昭注，《后汉书》，第3561页。

② 参见《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第4110页。又颜师古注《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天子校猎”句曰：“校猎者，以木相贯穿，总为阑校，遮止禽兽而猎取之。”第2563页。

③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3页。

④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205页。

⑤ 《汉书》卷七七《何并传》，第3266页。

⑥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延熹八年十一月注引《袁山松书》，第316页。

⑦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71页。

⑧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五《金石款识十五·丞相府漏壶》，纪昀等：《四库全书》第830册，第262页。

⑨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71页。

⑩ 《续汉书·舆服志上》：“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铃下、侍閤、门兰（阑）、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后汉书》，第3651页。

⑪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08页。

⑫ [晋]华峤：《汉后书》卷二，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1页。

曰：“广汉使所亲信长安人为丞相府门卒，令微司丞相门内不法事。”门卒的来源是在当地郡县征发的“更卒”，即每月轮换服役的编户民。按照当时的制度，百姓亲身服役为“践更”，若出钱雇佣旁人代役，则称为“取代”。门卒亦有相代者，如韩延寿为东郡太守，“归舍，召见门卒。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延寿遂待用之”^①。颜师古注：“代人为卒也。”地方官吏拥有安排民众更换服役的权力，如郭解嘱托县吏关照某人，“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②。相府门卒平常是由京师地区服劳役的民众充任，故京兆尹有权派遣亲信之人相代，借以监视丞相。

相府门内附近还应设有官员办公居住的“吏舍”。《汉旧仪》卷上曰：“（丞相府）东门、西门长史物故，廷尉正、监守。”是说驻守相府东西门的两位长史若去世，暂由廷尉佐官正、监代理。据《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所言，“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③其秩位甚重，杜佑称“盖众史之长也，职无不监。”^④相府日常事务悉由长史办理，如申屠嘉谓袁盎：“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⑤看来这二位长史是分别驻于东门、西门。相府虽有四门，但东西二门经常使用；刘敦桢先生曰：“门之分位，疑在百官朝会殿左右，非若后世东西辕门位于官寺之前。盖汉制天子祀宗庙，入自北门，入丞相府自西门，东行折北升殿必北面，殊无解于帝皇南向之尊也。”^⑥由于这两座府门地位重要，故分遣长史驻于门内附近办公，以便对其实施监控。又《风俗通义·怪神》曰：“太尉梁国桥玄公祖为司徒长史，五月末所，于中门外卧，夜半后，见东壁正白，如开门明……还床，复见之，心大悸动。”^⑦司徒长史在西汉即为丞相长史，亦可见其起居之处在中门以外，大门以内。长史之下，又有丞相少史。^⑧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图谋政变时，“丞相征事任宫手捕斩桀，丞相少史王寿诱将安入府门，皆已伏诛，吏民得以安”^⑨。丞相少史办公住宿的吏舍可能也在大门附近，贵宾莅临时负有迎送的职责，因此才承担了诱骗朝内政敌入府的重任，而不致引起对方的怀疑。

朝廷征召来京的贤士能吏，往往先到相府居住，等待安排职务。见《汉书》卷

① 《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2页。

② 《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第3186页。

③ 又《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载武帝时庄青翟为丞相，府有三长史。颜师古注认为其中一人是临时代理者，正职仍是二人。“《百官表》丞相有两长史，今此云三者，盖以守者，非正员也。”第2644页。

④ [唐]杜佑：《通典》卷二一《职官三》，第121页。

⑤ 《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1页。

⑥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刘敦桢文集（一）》，第137页。

⑦ [东汉]应劭撰，吴树平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2—363页。

⑧ 《汉书》卷七《昭帝纪》注引如淳曰《汉仪注》：“丞相、太尉、大将军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第227页。《汉旧仪》卷上曰：“丞相司直、谏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次三百石、百石。”[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8页。

⑨ 《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元年十月诏，第227页。

一下《高帝纪下》十一年二月诏：“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他们或称“丞相征事”^①，或称“待诏”。如《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曰：“辟强子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欲用之。”颜师古注：“于丞相府听诏命也。”西汉“待诏”人员可领取一定俸禄，多数是在皇宫的内外宫门旁候命。如东方朔，“上伟之，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②。宣帝时，“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③。《汉书》卷七五《李寻传》曰：“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上述宫门近旁必有专设屋舍以安顿这些“待诏”者，使其避免露宿风雨。由此看来，“待诏丞相府”者或许也会在府门附近有居舍歇息。由于史料缺乏，相府门内设置“吏舍”的详情暂时无法了解，可以参考秦始皇陵“园寺吏舍”设于西门之内北侧的发掘情况。^④

（二）相舍之外区

进入相府大门后继续前行，则遇到“中门”即第二道门及所属垣墙，其内为“相舍”，是府内丞相办公居住区域的统称。《史记》卷七九《范雎列传》记载了秦国相府的有关情况，与汉朝制度相类，可供参考。其文字如下：

范雎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见，有识者皆避匿，须贾怪之。至相舍门，谓须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待门下，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曰：“无范叔。”须贾曰：“乡者与我载而入者。”门下曰：“乃吾相张君也。”须贾大惊，自知见卖，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第2413—2414页）

由此可见，相府中门曰“相舍门”，有守门者曰“门下”，宾客车马可以进入相府大门，但须等待“门下”通报丞相，得到允许后方可驶入相舍。“相舍”或称“府舍”^⑤，又曰“丞相舍”，见《汉书》卷四九《爰盎传》：“乃之丞相舍上谒，求见丞相。丞相良久乃见。”颜师古注：“上谒，若今通名也。”亦是入府后在相舍门前投递名刺，请求召见。刘敦桢先生对此曾有概述：“至两汉官寺皆有官舍寝堂，以处眷属。其在丞相府者，简称府舍，又曰相舍。其舍至广，有閤，有庭，有堂，其后有吏舍以居掾属。又有客馆、马廐、车库、奴婢室等，以东閤推之，似在府之东部，然不能定也。”^⑥相舍之中，又可以用“阁（閤）”即第三道门及所属垣墙划分为内外两

① 《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元年十月诏注文颖曰：“征事，丞相官属，位差尊，掾属也。”如淳曰：“时官以时事召，待诏丞相府，故曰丞相征事。”张晏曰：“《汉仪注》征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减罪免者为征事，绛衣奉朝贺正月。”师古曰：“张说是也。”第227页。

②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2页。

③ 《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2821页。

④ 参见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第94—96页。

⑤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丞相傅婢有过，自绞死。广汉闻之，疑丞相夫人妒杀之府舍。”第3205页。

⑥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刘敦桢文集（一）》，第137页。

区，此处先对相舍外区之建筑设施及相关制度进行考释。

1. 相舍门与“门下”。须贾所至“相舍门”，即前述《汉书·佞幸传》董贤所入相府之“中门”，为三进式院落的第二道门。《周礼·天官冢宰》曰：“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郑玄注“中门于外内为中。”^①周代贵族之宅多以大门、中门、寝门划分区域，若天子诸侯之“三朝”。如公父文伯之母所言：“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②汉代高官贵戚之府第亦然，中门之内、寝门之外有前堂，是主人日常工作、待客之区域，众人不得擅入。如梁商，“每租奉到及两宫赏赐，便置中门外，未尝入藏，悉分与昆弟中外”^③。郑宝率数百人往见刘晔，“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于内宴饮”^④。

相舍门前有“门下”负责迎接来宾，其他官署、第宅亦有此类守门者。如郑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⑤。窦婴请田蚡赴宴，“夜洒埽，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⑥。此类“门下”是门吏的泛称，他们可以入内通禀长官，宾客或须向其行贿方能进见。如司马相如为使者过蜀，“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⑦。门下之吏随身携带兵器，“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⑧。他们有权对来宾进行检查，如隗不疑求见暴胜之，“盛服至门上谒，门下欲使解剑”，遭到拒绝后，“吏白胜之，胜之开阁延请”^⑨。相舍门吏的具体职称未见明确记载，按西汉大将军有“门下史”^⑩，又曰“门下吏”^⑪，郡县则有“门下掾”^⑫，或与相舍之“门下”相类。京兆尹及各郡有“门下督”^⑬，则为武职，恐非是。

2. 相舍之庭、堂。《汉书》载赵广汉“遂自将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责以杀婢事”^⑭。《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则曰：“发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击问之。”是赵广汉率众进入相舍后，将丞相夫人与奴婢从阁内召出，令其跪于堂前之庭下接受审讯。按汉代贵族高官之宅第、府寺中常设有前后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686页。

② 《国语》卷五《鲁语下》，第204页。

③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五，第598—599页。

④ 《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晔传》，第443页。

⑤ 《史记》卷一〇《汲郑列传》，第3112页。

⑥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8页。

⑦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7页。

⑧ 《续汉书·舆服志上》，《后汉书》，第3651页。

⑨ 《汉书》卷七一《隗不疑传》，第3035页。

⑩ 参见《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赞，第3583页。

⑪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光武留署门下吏。”第704页。时刘秀任更始大司马。

⑫ 参见《汉书》卷八三《薛宣传》，第3397页。

⑬ 参见《汉书》卷九二《游侠传·蔺章》，第3705页。

⑭ 《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第3205页。

二堂，前堂在中门之内、寝门之外，后堂则在寝门之内。如田蚡为丞相，“前堂罗钟鼓，立曲旃”^①；丞相张禹，“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筦弦”^②。前后堂又分别称为“正堂”和“北堂”。^③相府之正堂即百官朝会殿，如前所述，此殿主要为天子临幸及丞相主持百官与掾属会议、接受上计和举谣言等大型活动而设，其规模宏伟，乘舆可从相府东西两门驶至殿前，而相舍内区之阁（閤）门狭矮不容车乘（详见后说），故该殿似应设在阁外的相舍外区。相府之后堂建在阁内，规模较小，是丞相燕居听事和会晤宾客之地。如曹参担任齐国丞相，聘请名士盖公入相府，“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④。就是让出前堂留宿盖公，自己在阁内的后堂起居并处理公务。

3. 后园与吏舍、诸曹。相舍外区有花园和吏舍，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第2030页）这段史料反映出相舍后院即北部有花园可供游赏，附近还有属吏居舍。因为吏舍设在阁外，丞相平时听不到饮酒喧闹之声。可与参照的是吴祐任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祐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⑤。戴宏父为县丞，在佐吏中秩位较高，单独居住在“丞舍”，亦在官署的后园附近。按两汉制度，宫室府寺与第宅多有后园，园中设屋舍可供来宾或下人居住。如梁孝王进京请罪，“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⑥。朱买臣任会稽太守，“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⑦。后园有门称“园门”，即郡县官寺二进式院落的后门。如邓训任张掖太守、护羌校尉，羌人来攻月氏胡，“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四七此事“园门”词曰：“护羌校尉所居寺舍后园之门也。”^⑨由此看来，相舍之北门应为“园门”，其附近筑有吏舍，这种布局形制参见于汉代其他重要建筑。如东汉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安帝恭陵、质帝静陵，“园寺吏舍在殿北”^⑩，与《史记·曹相国世家》所言相府吏舍的情况相符。而顺帝宪

①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4页。

② 《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9页。

③ 参见〔西汉〕刘向撰，卢元骏注译《新序今注今译·杂事第一》：“史鰌死，（卫）灵公往吊，见丧在北堂，问其故？”随后从其遗愿，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徙丧正堂，成礼而后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页。《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传·赵壹》：“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第2631页。

④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29页。

⑤ 《后汉书》卷六四《吴祐传》，第2101页。

⑥ 《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085页。

⑦ 《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第2793页。

⑧ 《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第609页。

⑨ 《资治通鉴》卷四七《汉纪三十九》章帝章和二年，第1517页。

⑩ 《续汉书·礼仪志下》注引《古今注》，第3149—3150页。

陵、冲帝怀陵，“园寺吏舍在殿东”^①。汉武帝时公孙弘举贤良，“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②。颜师古注“阁者，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掾史官属也。”前引刘敦桢先生之语，即认为客馆是在相舍东部修筑。公孙弘“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③。但在成帝时似又恢复，故薛宣谓朱云：“在田野亡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④郡县吏舍亦有靠南修筑者^⑤，看来并无统一规定。

汉代官府中的“吏舍”可分为两类，秩俸较高之掾吏有专门办公的房屋，或称为“曹”，官吏上班称“坐曹”。如薛宣任左冯翊，“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⑥。或称“寺舍”，如西汉陈遵被大司徒马宫辟为掾史，“曹事数废。西曹以故事适之，侍曹辄诣寺舍白遵曰：‘陈卿今日以某事适’”^⑦。官吏下班休息，在署内别有居住的宿舍，如前述戴宏在父亲上班离开后于丞舍讽诵经书；张汤“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⑧。可见其舍只是饮食起居之处。小吏不能携带家眷入署，办公住宿是否同在一室则不清楚。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吏舍往往是集中修建的一组建筑，如秦始皇陵园西北部的园寺吏舍遗址。^⑨另外据考古发现，“东汉时河南县的衙署应在县城西南部。在这里发现了一段夯土墙，墙的南北两侧各有10个开间，开间长宽各约3.5米。算起来这里有20个房间，每个房间各约12平方米，可能正是县中小吏们办公的地方，即吏舍。目前发现的可能只是吏舍的一部分”^⑩。汉代公府吏员甚多，吏舍相当密集。《汉书》卷八三《朱博传》曰：“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而“丞相典天下诛讨赐夺，吏劳职烦，故吏众”^⑪。如“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⑫。《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亦载其为丞相，“阖府三百余人”，其吏舍的数量亦应更多。

① 《续汉书·礼仪志下》注引《古今注》，《后汉书》，第3150页。

②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第2621页。

③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第2623页。

④ 《汉书》卷六七《朱云传》，第2916页。

⑤ 张继海：“上文提到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小城图》则显示，城内靠南墙为诸吏舍，有‘□侍舍’、‘丞侍舍’、‘□史侍舍’、‘佐史侍舍’等，均注明菅盖，即为草屋顶。吏舍占了城内的很大面积。靠北城有‘马丞[侍舍]’，则可能是建马厩之所。”《汉代城市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⑥ 《汉书》卷八三《薛宣传》，第3390页。

⑦ 《汉书》卷九二《游侠传·陈遵》，第3709页。

⑧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137页。

⑨ 参见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第94—96页。

⑩ 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第123页。

⑪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9页。

⑫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8页。

西汉相府诸曹即各办公部门亦在相舍之中。据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考证,《汉书》所载有“东曹、西曹(见《丙吉传》),奏曹、集曹(见《匡衡传》),议曹(见《翟方进传》),侍曹(见《陈遵传》)”;至东汉丞相转为司徒后,“其属官大都划归太尉府”^①。按《续汉书·百官志一》载太尉府内共设十三曹,“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录省众事”^②。《汉旧仪》卷上记述与之有相应者,如丞相设四科之辟以选士录用,“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③。祝总斌先生认为,“第四科所补‘贼、决’,指贼曹、决曹”^④。笔者再做补充,其“三科补四辞八奏”,应是前引《续汉书·百官志一》所说的辞曹和奏曹,“四辞八奏”可能是指这两曹分管的四类、八类事务。诸曹办公的“吏舍”位置亦有不同,例如西曹、东曹可能是在相舍阁外庭院的东西两侧,而其他诸曹吏舍应如前引《史记·曹相国世家》所言,是在相舍后园附近,相当于郡守官寺设于廷北之“后曹”^⑤。如萧育为茂陵令,被太守传召“诣后曹,当以职事对”^⑥。如淳注曰:“贼曹、决曹皆后曹。”九卿府中的后曹亦称“北曹”,如《东观汉记》言张禹,“为廷尉府北曹吏,断狱处事执平,为京师所称”^⑦。又谢承《后汉书》亦言其“给廷尉为北曹史,每断法决处事执平,为京师所称”^⑧。可见张禹为决曹吏,其曹在廷尉府之北部,即为后曹。参照上述情况,相府贼曹、决曹或亦设在相舍北门之内后园附近。诸曹在府中的位置不同,应与各自职能的影响差异有关。西曹、东曹管理的事务最为重要,前者负责相府掾吏的录用,后者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因此受到重视,距离阁前较近且奏事为便。秦汉以居西而东向为尊,故西曹地位又略高。如汉末毛玠任丞相府东曹掾,“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⑨。

(三) 相舍内区

此区即为“阁(阁)”内。前文已述,相舍可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之门曰“阁(阁)”,阁内即丞相燕居之处。谢肇淛曰:“阁与阁,世人多混用之。阁,夹室也,

①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的丞相制度》。

② 《后汉书》,第3559页。

③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69页。

④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49页。

⑤ 《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胡广《汉官解诂》载岁末县吏诣郡上计,“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后汉书》,第3623页。

⑥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附子育传》,第3289页。

⑦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第685页。

⑧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280页。

⑨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毛玠传》,第375页。

以板为之，亦楼观之通名也……此楼阁之阁也。閤者，门旁小户也。汉公孙弘开东閤以延贤人，盖避当门而东向开一小门，引宾客以别于官属，即今官署脚门，旁有延宾馆是也。”又曰：“然则夹室谓之阁，旁门谓之閤，义自昭然。”^①而“閤”还有另义，即内宅的小门，其侧并无大门，非门旁之“閤”，或称做“中閤”。见《后汉书》卷七五《吕布传》：“（董）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此“中閤”之内即为后宅，吕布守阁有出入之便，故得以私通董卓婢妾。又汉桓帝欲纳梁商之女，遣吴姁、单超等赴其第内后宅观视。“商女女莹从中閤细步到寝。姁与超如诏书周视动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诏书如莹燕处，屏斥接待，闭中閤。”^②亦可见“中閤”即后寝之院门。此“閤”又称为“闺”，连称“闺閤”。如司马迁受腐刑后任中书令，“身直为闺閤之臣”^③，即表示他活动于宫禁之内。文翁为蜀郡太守，“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閤”^④。颜师古注：“闺閤，内中小门也。”相舍闺閤以内是丞相与家人生活的区域。王商任丞相五年，“闺门内乱，父子相讦”^⑤，因此被皇帝罢免。相府的外门和中门都可以出入车马，而“閤”为小门，不容乘舆，故前引《汉书·佞幸传》载董贤乘车入相府中门而下，孔光自閤内出迎见礼。“闺閤”的形制，据《说文解字·门部》曰：“闺，特立之户。上闑下方，有似圭。”其高度仅容成人平身而过。如《淮南子》卷一三《汜论训》曰：“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随后又言：“夫醉者俛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⑥“闺閤”之门虽小，亦分为左右。见《墨子·备城门》：“为闺门两扇，令各可以自闭。”^⑦

1. “黄閤”及阁下传唤制度。西汉相府之“阁（閤）”与其他官署“闺閤”的区别主要有二，见《汉官旧仪》与《汉旧仪》卷上：“（丞相）听事阁曰黄阁（閤），无钟铃。”^⑧分述如下：其一，相府之“阁”为黄色，故称“黄阁”，閤门与皇宫禁省的门阙颜色相同。见《续汉书·百官志三》：“黄门令一人，六百石。”刘昭注引董巴曰：“禁门曰黄闑，以中人主之，故号曰黄门令。”^⑨按汉武帝太初元年五月，“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⑩。朝廷以黄色为尊，故后宫之禁门为黄闑。而相府之闺

①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上海，中央书店总店，1935年，第123页。

② [汉]无名氏撰：《汉杂事秘辛》，[明]陶宗仪等编：《说郭三种》卷一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66页。

③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6页。

④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6页。

⑤ 《汉书》卷八二《王商传》，第3373页。

⑥ [汉]高诱注：《淮南子》，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31页。

⑦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第480页。

⑧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36页，67页。

⑨ 《后汉书》，第3594页。

⑩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9页。

閤竟与禁闼同色，亦可反映丞相地位之隆重。东汉废丞相，立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皆为宰相，其閤（閤）均涂黄色，此项制度沿袭到南北朝。如刘宋王莹，“既为公，须开黄閤”^①。北魏王琼，“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閤”^②。《陈书》卷三一《萧摩诃传》曰：“旧制三公黄閤听事置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閤，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③宰相卸任后闺门即不能用黄色，如刘劭弑君篡位，任命何尚之为司空；后刘劭兵败被杀，“尚之父子共洗黄閤”^④，以至受到张畅的讥讽。前引《汉旧仪》卷上曰：“掾见脱履，公立席后答拜。”亦是入閤谒见丞相之礼。东汉以三公为宰相后，外人入閤脱履的制度延续到后代。例如南朝台官“诣三公，必衣衾。至黄閤，下履，过閤还，著履”^⑤。丞相有属吏曰主簿^⑥，亦称“黄閤主簿”^⑦，严耕望先生言其为閤下群吏之长，职最亲近。考证曰：“韦昭《辩释名》：‘主簿，主诸簿书，簿并关诸事。’是也。曹公卞夫人《与杨太尉夫人书》：‘主簿，股肱近臣。’（《古文苑》一〇）《汉书·严延年传》，为河南太守，‘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主簿亲近吏，不得闻知’。则公府郡府之主簿皆为属吏中之最亲近者。”^⑧汉成帝召王嘉诣廷尉诏狱，主簿出面代表掾吏劝丞相服毒自杀以免受辱，“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并举鸩逼迫，“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⑨，由此可见其身份职位之特殊。因相府閤门南向，祝总斌先生认为“黄閤主簿”即《汉旧仪》所言之“南閤祭酒”^⑩，其说从略。

其二，相府閤内无钟铃。汉代九卿及郡县长吏在閤内设有铃铎，以供传唤属下。“事大而急者用钟鼓，小而缓者用铃籥，彰事告急，助口气也。”^⑪閤门附近安排有铃下、侍閤等属吏，听候招呼，传达指令。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七九曰：“铃下者，有使令则掣铃以呼之，因以为名。”^⑫长吏外出时铃下亦随驾服侍。如《汉官仪》卷上载太常、卫尉等官员出行，“驾四马，主簿前车八乘，有铃下、侍閤、辟车、骑吏、五百等

① 《南史》卷二三《王诞附莹传》，第622页。

② 《魏书》卷三八《王慧龙附琼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878页。

③ 《陈书》卷三一《萧摩诃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411页。

④ 《宋书》卷四六《张劭附兄子畅传》，第1399页。

⑤ 《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36页。

⑥ 《汉书》卷八一《匡衡传》：“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第3346页。

⑦ 《续汉书·百官志一》“太尉”条言诸曹之后，“黄閤主簿录省众事”。当是继承西汉相府主簿职称。《后汉书》，第3559页。

⑧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124—125页。

⑨ 《汉书》卷八六《王嘉传》，第3501—3502页。

⑩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47—49页。

⑪ [东汉]王充：《论衡》卷一五《顺鼓篇》，第242页。

⑫ 《资治通鉴》卷七九《晋纪一》武帝泰始五年，第2509页。

员”^①。官员、宾客谒见，亦由铃下接待并入阁禀报。如吴范见孙权求情，“乃髡头自缚诣门下，使铃下以闻。铃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后勉强应允，“乃排阁入。言未卒，权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范因突入，叩头流血，言与涕并。良久，权意释”^②。西汉相府阁内不设钟铃，亦无“铃下”之吏，担任传呼工作的有两种人。一是主簿，如前引《汉旧仪》卷上所言，丞相召见属吏，通常命主簿传唤。“掾有事当见者，主簿至曹请，不传召。”^③二是守阁奴婢，府中吏员欲求见丞相，须叩阁呼名请其通报。“诸吏初除谒视事，问君侯应阁奴名，白事以方尺板叩阁，大呼奴名。”^④《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亦曰：“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⑤东汉不置丞相，以三公并列，仪制相仿，其阁内皆设铃以呼人，有铃下以供驱使。如《续汉书·舆服志上》载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铃下、侍阁、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⑥。太尉和司徒府内都有铃下掾吏^⑦，表明阁内不设钟铃与铃下吏是西汉相府特有的制度。

2. “阁”与“听（厅）事”。前引《汉旧仪》卷上曰：“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按“听事”一词有两义，其一为动词，或曰“视事”，即上朝处理公务，听取下属汇报。如汉宣帝，“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传奏其言，考试功能”^⑧。盖长公主诬告胡建，“大将军霍光寝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听事，下吏捕建，建自杀”^⑨。官员如停止办公视事则关闭阁（阁）门，拒见群吏。如韩延寿任左冯翊，外出行县，“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⑩。汉朝制度规定，官员处置公事、听取属吏报告有固定的时间，每日共早晚两次，在“旦”时和“哺”时，亦称“朝哺（晡）”^⑪；官员在此之外的时段可以不处理公务。如费祎为尚书令，“常以朝

①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185页。

② 《三国志》卷六三《吴书·吴范传》，第1423页。

③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汉旧仪》，第67页。

④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汉旧仪》，第71页。

⑤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第1220页。

⑥ 《后汉书》，第3651页。

⑦ 《续汉书·五行志五》注引《风俗通》曰太尉邓盛，“遣令史谢，申以铃下规应掾自行之，还具条奏”（《后汉书》，第3343页）。《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载东汉钟皓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泞……还府向阁，铃下不扶”（第392页）。又《太平御览》卷三三八《兵部六十九》引《魏志》曰：“盖公府阁有绳铃以传呼，铃下有吏者也。”（第1552页）。

⑧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7页。

⑨ 《汉书》卷六七《胡建传》，第2912页。

⑩ 《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3页。

⑪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卷一四《爱日篇》：“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庭者，非朝哺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笺曰：“‘哺’旧作‘晡’。按《说文》云：‘晡，旦也。晡，日加申时食也。’又申字下云：‘吏以晡时听事，申旦政也。’高诱《淮南子叙》云：‘除东郡濮阳令，以朝晡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后汉书·赵熹传》云：‘朝晡入临。’晡、晡古通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4—215页。

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董允代祜为尚书令，欲敦祜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滞”^①。閤门平时关闭，但在“朝舖”听事之前是必须打开的。例如彭宠与妻子在閤内遭到暗杀，“明旦，閤门不开”，准备奏事的官属觉得反常，才胆敢“逾墙而入，见宠尸”^②。此项制度究其渊源，是从周代天子诸侯的“日朝”演变而来的。西周春秋时期，臣下每日早晚朝见国君。丁山先生据《左传》的有关记载考证，认为《诗·小雅·雨无正》中“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之“朝”为“早上朝会议政”，而“夕”则为傍晚修改政令。“一早一晚，总该有若干重要的官吏帮助封建主处理国事。”^③其说可信。除了大臣参加早晚朝会，有时他国贵宾也要出席。如鲁昭公出亡在齐，“齐侯请飧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飧焉’其饮酒也”^④。秦代以来，天子渐不亲政，改为数日一朝；而百官却仍要“朝舖”处理公务。据《汉旧仪》卷上所载，西汉丞相的“听事”程序比较简单，并非像其他长吏那样要举行正规的早晚朝见仪式，只是让下属在清晨入阁分别口头汇报。“官属吏不朝，旦白录而已。”^⑤

“听事”的第二种含义为名词，即官员办公所坐之堂。罗哲文先生曾说：“按照汉代官署制度，门内有庭，过庭才是主要的建筑‘堂’或称‘听事’（亦称厅事），为其治事之所。”^⑥郡县官寺多为两进式院落，其“中门”即“閤（阁）”，堂下庭院因在中门之内，又称“中庭”，以此与閤外的前庭相区别。“听事”一词有时包括堂和中庭，见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八九：“中庭曰听事，言受事察讼于是。汉、魏皆作‘听事’，六朝以来，乃始加厅作厅。”故“听事”亦作“厅事”，“听事阁”又称“厅事阁”。如建安元年（196）六月，“（吕）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攻阁，阁坚不得入”^⑦。汉朝官署听事即堂上有室可以居住。如苏不韦（违）父为李嵩所害，“（李嵩）迁司农，不违穿府北垣，径上厅事，斫嵩卧具，嵩一宿数迁”^⑧。又王朗与许靖书曰：“是时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刘景升听事之上，共道足下于通夜。”^⑨按周秦两汉通制，堂与寝室同处一台之上，屋顶共用，前后仅有一墙之隔。如刘敦桢先生所言：“然汉官寺自九卿郡守，迄于县治邮亭传舍，外为听事，内置官舍，一如古前堂后寝之状。”^⑩如前所述，西汉相府正堂即百官朝会

① 《三国志》卷四四《蜀书·费祜传》注引《祜别传》，第1061页。

②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第505页。

③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页。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七年，第1489页。

⑤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第71页。

⑥ 罗哲文：《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

⑦ 《三国志》卷七《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第224页。

⑧ 《太平御览》卷七〇八《服用部十·卧具》引《风俗通义》，第3156页。

⑨ 《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注引《魏略》，第968页。

⑩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两汉官署》，《刘敦桢文集（一）》，第137页。

殿，似设于阁外，阁内视事起居另有后堂。故曹参聘请盖公入齐国相府，虽然让他住在正堂，而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处置公务并不受到影响。

3. 东、西箱（厢）与“更衣”。相府之堂有东箱、西箱。如霍光欲废昌邑王刘贺，派司农田延年赴相府与丞相杨敞商议。“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①东、西箱（厢）即堂后寝舍左右的夹室，《汉书》卷四二《周昌传》述刘邦于殿上与群臣议废太子事，“吕后侧耳于东箱听”。颜师古注“正寝之东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②而田延年下堂所赴之“更衣”即厕所，如王充所言：“且凡人所恶，莫有腐臭。腐臭之气，败伤人心，故鼻闻臭，口食腐，心损口恶，霍乱呕吐。夫更衣之室，可谓臭矣；鲍鱼之肉，可谓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为忌；肴食腐鱼之肉，不以为讳。”^③清儒黄生考证说：“盖贵者入厕，出必更衣，如王敦在石崇家入厕之事可证。当时即谓入厕曰更衣，此是文言，《汉书》中说此者非一，如《窦婴传》坐乃起更衣，稍稍引去。又《通鉴》隋文帝所宠陈夫人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又宋人《海陵三仙传》独处一室，卧起方丈间，食酒肉如平时，而无更衣之处。皆用《汉书》之意也。”^④相府前后堂皆有“更衣”，前引应劭《汉官仪》言百官朝会殿曰：“国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黄生释曰：“朝会之地，贵者必各置更衣，避私褻也。”^⑤更衣之室置于殿堂西侧，于古礼相合。按周代典制，诸侯大臣之堂有东西两阶以供上下，贵宾从西阶，主人从东阶。如信陵君窃符救赵，“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⑥。西汉亦然，王侯公卿至相府为贵宾，依礼当沿西阶升降，故其更衣设在堂下西侧，显然是为了方便往返的缘故。前引《汉书·杨敞传》载“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云云，看来亦与此制相符。田延年代表霍光来相府谋划政变，需要回避众人，自应是在阁中的后堂会晤密谈，客人内急则下西阶而赴堂侧更衣之室。杨敞夫人为主妇，上下堂当由东阶，故匿于后舍之东箱窃听，位置在主人身后，与宾客座位相错。其礼仪即如李尤《堂铭》所言：“延宾西阶，主近东厢。宴乐嘉客，吹笙鼓簧。”^⑦

① 《汉书》卷六六《杨敞传》，第2889页。

② 《汉书》卷四二《周昌传》，第2095页。

③ [东汉]王充：《论衡》卷二三《四讳篇》，第358页。

④ [清]黄生：《义府》卷下《溷轩》，[清]纪昀等：《四库全书》第858册，第328页。

⑤ [清]黄生：《义府》卷下《更衣》，第328页。

⑥ 《史记》卷七七《魏公子列传》，第2382页。

⑦ 《艺文类聚》卷六三《居处部三·堂》，第1137页。

五 结语

综上所述，西汉长安丞相府的建筑布局及设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官署，而与皇家宫室宗庙陵寝制度相似。如丞相所坐正堂称殿，可供天子临幸、百官朝会；府为四出门，建有黄阁等等。以上特点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政治领域发生的变革，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君主渐不亲政，外朝势力益盛而丞相大权专揽。古代已有多位先贤注意到周秦之际官僚制度的这些变化。如何武言：“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①刘颂曰：“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②《唐六典》则称：“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置尚书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汉初因之。”^③由于丞相执掌了过去天子处置政务的许多权力，以致被黄宗羲称为“是官者，分身之君也”^④，因此与其他官员有别。从某种角度来看，相府建筑的上述特点可以看作是丞相职权膨胀的某种表现。西汉王朝建立巩固之后，君主专制集权制度逐步加强，至武帝时广设中朝官，又立大司马大将军以统之，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势力渐被削弱。西汉后期至东汉，这一趋势继续发展。朝廷罢丞相为司徒，以三公并立，又将司徒府的许多部门转移到太尉属下，司徒所辖员吏由三百余人减至六十余人^⑤，“四出门”等皇室建筑形制也不再使用，只是将百官朝会殿与黄阁等旧制保留下来，成为上个时代丞相权力显赫的历史遗迹。

（作者宋杰，1952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收稿日期：2009年3月2日

① 《汉书》卷八三《朱博传》，第3404页。

②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第1303页。

③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三师三公尚书都省》，第6页。

④ [清]黄宗羲著，李伟译注：《明夷待访录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29页。

⑤ 《续汉书·百官志一》载司徒属下有“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后汉书》，第3561页。